

郑永年专栏

政治凌驾科学与西方抗疫问题

冠状病毒疫情在各国散播，各国抗疫成绩相去甚远。造成各国之间抗疫差异的因素有很多，但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矛盾，无疑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；处理得好，不仅疫情可以得到控制，而且社会经济也不至于损失惨重。

政治即是利益表达，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，无论是西方那样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，还是像中国那样的自上而下的利益表达。科学即是如何最有效预防、阻断疫情的传播和拯救生命，不会把重点置于其他任何方面。

冠状病毒疫情中，政治和科学之间的矛盾即表现为生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，也表现在生命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。再者，如何处理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，本身就需要科学。

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，东亚社会的抗疫很显然是比较成功的，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政府在抗疫过程中，能够实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。东亚社会的这个特征，和这些社会的官僚治国传统有很大的关联。技术官僚治国的一个主要特征，就是这个群体在诊断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，不会去诉诸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，而是诉诸于科学的理性和逻辑。韩国和新加坡等社会被西方视为是抗疫的典范。

韩国和新加坡对一些社会群体（例如旅游者）使用了侵入式监控体系，来减缓病毒的流出速度，甚至阻隔病毒的传播，但对一般老百姓则没有采取过于极端的举措。这样做无非是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，抗疫和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。

政治过度导致抗疫不力

中国的举措更为极端一些，但很多方面也和其他亚洲社会类似。这也是有理由的。疫情在武汉（湖北）暴发，中国中央政府断然作出封城（省）的决定。这种极端的举措拯救了无数生命，但也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，中国第一季经济基本上就没有了。但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像后来韩国和新加坡政府那样，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从而减少经济损失呢？这些只是事后（诸葛亮）的解释。这些极端的举措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。

在很大程度上说，中国尽管牺牲了经济活动，但应对疫情扩散的方法，包括大规模的举国动员、跨省支援、两山医院建设、方舱医院的设置等，都表现了很大的科学性。换一句话说，尽管中国抗疫中也是有政治的，表现在早期地方政府对言论的过度管控上，但在全面抗疫开始之后，政府没有妨碍科学，而且政治助力科学方法的使用到了极致。

这种做法经常招致西方的批评，认为政府过于专制，违反自由人权，连方舱医院也被视为是新型“集中营”。但正是科学方法的使用，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。用美国学

者福山的话说，中国是非西方社会抗疫成功的例子。

西方是另一种情形。如果说中国是政治助力科学，西方可以说是政治凌驾于科学。政治过度而科学不足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尤其是被视为西方民主典范的英美两国。

英国卫生部5月5日公布，全英国已经有2.94万人死于冠状病毒，这意味着英国已经超越了意大利，成为冠病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，仅排在美国之后。从疫情一开始，约翰逊政府一直被各界批评反应不足，包括过早放弃检测和追踪的围堵策略，封城举措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，甚至首相及卫生部长也曾经确诊。英国分析家认为，这是英国约翰逊政府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造成的。

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，一直在抱怨中国早期的行为，认为是中国的“隐瞒”和“迟疑”导致了疫情在全世界的流行。不过，这种推责行为解释不了这些国家本身为什么那么迟疑。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将冠状病毒列为“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”，而英国本身次日也确诊了首例感染者，均为中国公民。

不过，约翰逊政府在2月初仍然沉浸在脱欧的喜庆之中，并发表庆祝脱欧的演说。媒体也发现，首相缺席了多场商讨抗疫对策的“内阁办公室简报”会议，显示首相相对疫情并不重视和关心。英国政府的抗疫决定，也一直被批缺乏透明度，“内阁办公室简报”会议一直是秘密的。尽管政府也参考了“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”的科学建议，但一直没有公开小组成员的名单。这个专家小组早就预警，如果不采取有效举措，英国到3月初八成人口会感染，但首相仍然只建议民众多洗手，也称自己探访医院时有跟每一个人握手。政治对科学的蔑视和分歧是显然的。

很多人也记得，西方媒体当时也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疫情区时戴着口罩，认为这是中共领导人脱离社会的象征。但是后来，西方媒体从来不缺用更为激烈的语气，去批评他们的总统或者首相，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不戴口罩的行为。

英国政府在3月12日透露，已经结束抗疫计划第一阶段，由通过检测和追踪以围堵病毒改为纾缓政策，要求所有出现症状者自我隔离一周，但社交距离举措及停课安排仍在考量之中。很多人认为，英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该放弃围堵策略。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（Patrick Vallance）在13日提出“群体免疫论”，即让全国六成人口感染以产生免疫力，长远保护整个社区。这在英国引起极大争议。当时英国已经有近800宗病例，但许多大型活动仍在进行。

与此同时，意大利、法国和西班牙

已相继封城，德国则采取严格的社交距离举措，并推行大规模的检测及追踪。之后，英国政府又倒转回头，多次强调群体免疫只是科学概念，并非实际的抗疫政策的一部分。

3月16日，由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权威专家弗格森（Neil Ferguson）所带领的研究团队，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，被外界视为逆转英国政府抗疫态度的关键。根据这份报告的推算，如果继续采取纾缓政策而非围堵策略，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（NHS）将超负荷，或导致25万人死亡。之后的一周，政府内部就应否封城出现激烈辩论。

尽管卫生官员认为封城势在必行，但财政官员担心封城会影响经济活动。不管如何，这场争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在政策争论期间，病毒在加速流行，但老百姓生活如常。直到20日政府才下令关闭学校、酒吧、饭店和其他社交场所，23日才实施封城。

在美国，政治凌驾科学的情况比英国更为糟糕。抗疫开始迄今，美国抗疫故事每天似乎是围绕着行政权力，即总统和科学家专家群体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。总统和国会围绕着如何应付美国的经济问题而有互动和交锋，但并不是主线。

政治如何凌驾科学

政治凌驾科学在三个层面展开。首先是政治人物个人层面的政治。这里特朗普无疑是主角。特朗普为了其个人权力、选举等考量，不惜否定专家的科学建议。特朗普上任以来屡屡否定与其立场相违、甚至指正其错误的权威意见与实施，以扩张其个人权威。这次疫情中，特朗普把这种情况推到了极端。总统多次无视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（CDC）官员及其他专家基于科学的建议，淡化疫情，提出未经证实的疗法。

他甚至建议用注射消毒液的方法，来杀死人体内的冠状病毒。尽管他稍后否定，但美国已经有些老百姓按照总统的方法做了。总统个人的傲慢也导致了白宫的失守，一些工作人员确诊感染冠状病毒。总统个人在要不要戴口罩问题上浪费了很多时间，最终决定戴了，但总统本人还是经常不戴，连白宫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行为规则。

个人利益也表现在一些国会议员在疫情期间的行为中。利用内部消息而出让股票的事例中。

其次是利益集团层面的政治。这主要表现在对经济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的争论，及其相关的政策之中。美国的很多保守派政治人物，无论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和地方层面，一直把经济置于生命之前，甚至公开主张为了经济可以不惜人民的生命。尽管这种争论不可避免，但经济重于生命的理念，的确影响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抗疫政策的有效性。

到抗疫，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呢！

在西方国家中，德国无疑是抗疫的一个典范。德国冠病死亡率仅2%，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3%和西班牙的10%。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，但德国领导层能够在政治和科学之间达成平衡，无疑是关键因素。正如美国人把美国疫情的扩散归功于总统特朗普，德国人把德国抗疫的成功归功于其总理默克尔的强有力领导。尽管在疫情早期，默克尔因在欧洲未能发挥足够有力的领导作用而受到批评，但德国采取的有效应对举措，受到广泛的赞誉。

作为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，她遵循科学建议，并虚心地从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中学习。美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的以及最聪明的科学人才，但特朗普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，反而经常与科学家闹意见。默克尔则全然不同，她所依靠的德国国家科学院团队，不仅包括医学专家和经济学家，还包括行为心理学家、教育专家、社会学家、哲学家和宪法专家。

在任何国家，政治是客观存在的，也不可或缺。在民主国家，政治被视为是防止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，或者其所代表的党派利益而去专权的途径。但如果政治凌驾了科学，就很难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去挽救老百姓的生命。恢复经济活动也并非没有道理，因为如果社会停摆，经济垮了，就会产生其他更多的问题。

历史地看，随着企业的大量倒闭，失业人口大量上升，民生生计困难，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不可避免；同时也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因吸毒、心脏病、抑郁症等跟经济受挫有关的问题而死亡。因此，恢复经济运转有其必要性。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逐步开放，而非根据意识形态来进行。

如何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？这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东亚社会在这方面的表现要远远优于西方社会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
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